

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

張佛泉

從日本歸來

湯爾利

太監

豐明

蘇俄旅行記(一)

丁文江

關於科學研究之我見

壽鳴

對於秦氏全家自殺的意見

衡哲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 大學出版社	武昌	新生活書店 真美善書店
天津	中書社 嘉陵書社	南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濟南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廣州	興報社 新光書局
上海	增華書社 華華書社	汕頭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
南京	安市場 偏文(代定)	梧州	大東書局
蘇州	景華書社 華華書社	梧州	興報社 新民書局
杭州	記書社 王序井 民智書	梧州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寧波	局 寶內 佩文齋 微甸	梧州	
溫州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梧州	
福州	海軍倉 胡野書店 朝	梧州	
廈門	大南書局	梧州	
汕頭	清華附設社 成府 進分社	梧州	
廣州	天津書局 代定 南開大學	梧州	
香港	大生書局 文光書局	梧州	
澳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梧州	
新加坡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	梧州	
檳榔嶼	定遠 亞東圖書館 光	梧州	
泗水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梧州	
三寶壟	新中華書局 代定 鍾山	梧州	
巨港	花牌樓書店 代定 中央書	梧州	
望加錫	書 正中書局 天一書店	梧州	
坤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梧州	
安汶	南通 三友書店 代定	梧州	
萬隆	常熟 張華書店 現代書局	梧州	
日惹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梧州	

從立憲談到社會改造

張佛泉

(上)

近來談憲法問題的，多半都就着立法院所公佈的憲草一直批評下去。我在國聞報第十二期寫一篇文章，題目爲「批評憲法草案以前」，對於目前立法的先決問題微然討論了一下。我曾指出立法手續上的矛盾和憲草內容——

即五權憲法論——中的內在困難。換言之，我以爲（一）在訓政失敗之後，憲政實際經驗絲毫沒有時候，立法院沒有資格依據建國大綱中某條來起草法案，因爲「這樣割裂孫先生的條文，非但失了他的精神，並且毀了他的一貫的政治理想」（用胡適之先生語，見獨立評論第九十六號第五頁），忽略了他在建國計劃裏面對憲法所持的極端的慎重態度；（二），中山先生的五權論，本有些內在的困難，並且始終也沒經過認真的試驗，至少還沒有試驗到最後決定成功與失敗的地步。所以此時將中山先生的五權論詩爲永久法典的時機，似乎尚未完全成熟。

我祇不過對「怎樣立憲」和「立怎樣憲」的問題稍加以批判而已。我並沒有不贊成立任何憲法的意思。

梁漱溟先生在四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發表一文，題爲「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梁先生所討論的問題，可以說比我所提出來的，更深入一層，他認爲憲法在目前的中國是根本不會發生效力的。

梁先生從事于農村工作者有年，他提出來的問題，我覺得是嚴重極了。我們（尤其是主張徹底改革社會政治經濟等制度的人）對於中國人太重習俗而沒有法律觀念的一件事實，非先予以認真的考慮不可。

中國人多少年代以來，始終沒有達到嚴格的法治階級。孔子所說的「道的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一套的話，聽起來當真要比提倡刑罰必於民心的法家的主張體面得多。但是真正的法治到底該是甚麼樣子，我們中國人自己始終也沒有夢到過。西人由爭個人平等自由的動機出發而得到的治法，和因經濟關係複雜而發展到的嚴格法律觀念，中國人更沒有夢到過。民間發生糾紛，能以和解辦法解決的，才是理想。甚至官廳下的命令，都不直接了當把內容說清便算了。

事，裏面必定加上許多說理的解釋，以希將人民先「說」服。所以中國人沒有 *Intuitive Concept of Law*，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

承認了上面所提出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梁先生所說的「須知中國今日所苦在任何法律制度之無效，而非在那法治的不合適」的話，是有很深刻的意義的。

梁先生的思想方式，和政治哲學上稱為歷史學派的（*Historical School*）幾乎完全是一樣。他說我們如要有憲法，必須要牠由「固有歷史演出來」。他又說「一種法律制度雖出於意識之制作，要莫不有與之相應的習慣為之先。否則，是運用不來的」。中國今日與新制度相應之新習慣，是還沒有有的。因此他不但祇以為「中國此刻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他更進一步說，「照我們的眼光見地看來，將必為新禮俗之創造。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組織構造要於禮俗表著之確定之，而不是以法律替換過禮俗」，所以「制憲非急務，果有心乎制憲，且先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可見梁先生不但以為這次制憲不會成功，並且以為

制憲這條路根本是徒勞而無功的，有這力量，實不如作一些從「平地向上爬」的功夫，然後等到「養成新生活習慣，新禮俗」的時候，那時便可以自然產生出一個新的憲法

出來。

（下）

但我以為歷史學派的論證也不可以推到極端。若推到了極端，則有意識的改革都成為不可能，而祇有待社會自然滋長變化去。梁啟超先生是主張改革社會的人，當然不主持這種被動式的論調。不過照梁先生的計劃，至少有幾個問題，也應當加以考慮。

第一，我們對於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改造歷史，與歷史的不自批判地自然地滋長，要加以區別。歷史自然生長的期間，社會推進的力量可以說由下而上的。但有目的的改革社會，其力量必須是由上而下的，至少是應由上層的一部改鑄下層，使改鑄過的下層再滋生所想要的上層之全部。歷史學派者雖能引歐洲後來的野蠻民族，經過一個整個的黑暗時期，一直到文藝復興，才算養成一個 *Greek kind* 作例，但理想主義者却可以舉蘇俄革命等等作反駁。蘇俄革命雖然與牠的既往歷史是兩件連續而生的事，但我們究未敢斷定說其中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如這樣講，歷史學派就已變成歷史宿命論了。

至于一個理想還是由「外面世界潮流所開出來的」？還是從「固有歷史演出」？這却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我們

祇須分別牠應否當爲我們的理想，而不必管牠的來源英。法革命的理想是由自己歷史演出的；美俄革命的理想便是外借的（我所提的美國，是指她三權鼎立的憲法來自法人孟德斯鳩的理論而言）。並且外來的理想也不見得比「家做」的理想難以實現。

第二，我們應當切記「機械性」的禮俗習慣在未形成之前，必須先經過一個積極努力，有意識的奮鬥的時期。所以欲以一種禮俗代替另一種禮俗時，其過渡期間終須經過一個非「禮俗」的期間的。若想以一個硬化了的禮俗，機械地換上另一個硬化了的禮俗，如同在地板上抽出一個木塊，換上另一木塊一樣，恐怕便是一種很大的錯誤。我以爲我所提出的這一點很重要。走梁先生一條思路的諸位，如能當真承認了這個新舊禮俗的過渡的「星雲」的時期，我敢說他們整個的思想系統都會發生動搖的。他們雖然仍可以說「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組織構造要於禮俗表著之確定之」，却一定不會再否認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即使是不穩固的或曇花一現的），對於形成一種禮俗，絲毫沒有功效；一定不會再堅持立憲連教育的功能都沒有，而屢次講制憲非急務了。

我覺得如以中國舊禮俗作基礎，西方社會以及一切上

層構造（請容我用這半句馬克思主義的套語），是絕對建築不起來的。但在新禮俗沒有形成之前，必先經過一次可以左右禮俗的根本觀念的普遍改革，而不能便直接空虛地去運動「養成新生活習慣，新禮俗」。在新禮俗沒有形成之前，如不特別注意到基本概念之樹立，不但任何新禮俗也養不成，即由許多不相聯屬的「實驗運動」中養成的禮俗，恐怕也不會是全國一致的，而結果也許是害大利小的。

第三，我們應曉得，若必向全體民衆中去求推動歷史的力量，這要求也未免有些過奢。若必待「全國人」有一致的意思要求，然後方能「演成一種政治構造」，則新的政治構造恐怕便永也得不到。研究歷史怎樣動進問題的人，必須先承認一般人永是落在上層的活動與結構的改造之後的。Edmund Burke 所說的：「在政治方面，一般民衆至少要落後五十年。」是一句實話。其次我們須承認，一般的大衆，很少有改造環境的能力，而多少是待環境來改造他們的。所以我覺得要解釋歷史邁動的方式，我們須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大衆。我們常說的「時勢造英雄」這半句話，祇足解釋某特出人才在某時某地之所以成功的原故，而未如上半句「英雄造時勢」富有解釋歷史動進的意思。所以若想求得一個順序的解釋歷史的方式，

應當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大眾」。

唯物史觀論者能解釋一般人怎樣被環境推着動，而忽略了推動歷史的原動力。梁先生要每個鄉下人先養成新禮俗新生活習慣，然後再「建立中國新社會的組織構造」，恐怕却有求人爲造時勢的英雄之嫌。

++

總之，我以爲梁漱溟諸位先生，能着眼到政治構造背後的禮俗問題，實在比專講政治革命的人，已經深刻一層。但是我同時以爲在梁先生所走的思想途徑中，至少有上提出來的三個問題要考慮。我相信若待梁先生現在所進行

從日本歸來

我這回因爲日本醫學會約我赴會，所以到日本去走了一次。我的兒子也是一個醫生，順便帶他去看一看他們各處醫大的設備，並且讓他曉得人家對於學問是怎樣一種研究精神。在東京住了兩個多星期，各地旅行，約有一個星期，來往一個多月。因爲碰巧在這種時節，回國以後，各方面的朋友都問我見了些什麼人，聽見些什麼話，甚至於有人對我說，可否把不甚秘密的話告訴我們聽聽。我的回

的工作稍有成績的時候，中國統治權恐怕也要到旁人的手裏去了。

我幾年來便主張在這新舊禮俗交替的過渡期間，先給一般人換上一套新的基本概念，作公民，作人，處世，等等基本觀念。我所想像的方法，也與梁先生所用的大不同。

回到立憲問題上，我不大贊成當局所取的立憲方法和其中的內容。但我以爲若連立憲的教育功能都加否認，也未免太悲觀了。

五月十二日，于天津。

湯爾和

答是「所談既無秘密之話，老夫亦非秘密之人」。

不錯，我見的人們，除去醫學專家之外，確也不少，所談確也很多。我一天到晚應接不暇的時候，曾經對我兒子說，我在家里一個月所說的話，不及在此地一天的多，也就可想而知。

但是除掉應酬敷衍之外，關於時局的談話，可以記載的實在很有限。即使記錄下來，也沒有什麼使人驚心動魄

，聞所未聞的新鮮材料。反正不外老生常談，翻來覆去那幾句家常老套。譬如廣田外相對我說：

「在這種環境之下，不宜有所主張。我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決不有所要求，也沒有何等提案。因為我深曉得中國當局處境的困難。日本方面，很有攻擊本人不知道利用機會的，但是在這種人心不安之下，日本縱使有十分好意，提出任何談判，中國人眼光看來，都是侵略。所以第一是安定現狀，維持既有的空氣。等到有諒解的機會，然後再披誠相見。」

又如重光次官對我說：

「現在人心雖漸見安靜（這是四月初的談話），但是常有謠言，總不外日本對於華北尚有野心，但是日本確無此種惡意。本人方針，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即使發生事故，立即設法消滅，不使擴大。前年因為要設法消弭隱患，回到東京，上海事變，就在我離開的時候爆發。後來趕回上海，一手促成停戰協定。在未簽字之先，自己忽然被炸。當昏迷之際，尚深恐協定從此破壞，後來曉得是朝鮮人幹的，陡然放心。沒多時，協定居然簽字，自己雖然失

却一條大腿，不獨毫無怨尤，並且引為滿足。」他說到這裏，把洋服袖子拉起來給我看，自手到臂，一塊塊都是傷痕。又如某某前當局對我說：

「凡是一個政治家，遇到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暫時不如攔起，可能的事情，應該有充分的勇氣。中國人在這時候，倘使向日本政府要求交還滿洲，沒有人敢答應這句話。即使我自己再上舞台，亦決不能辦這件事。但是……一是時代錯誤，二是地域人種與朝鮮台灣不同。

他的懷舊談中，有一段說是：

「九一八事起之後，當局者立即訓令駐使，忠告中國，趕快談判，一方面日本停止軍事行動。駐使重光立刻趕到南京，與當時的某要人（不是王正廷）商量。某要人也認為唯一的道路，差不多已有談判的準備。不料當時忽然有一個口號，就是反對直接交涉。數日之間，這種口號，變成金科玉律，某要人也是迫於大勢，無可如何。鬧到今天，只好歸諸兩國運命……」

又如貴族院的某某老輩對我說：

「今年春天，有人要募集一筆款項，在東京創立日

滿會館，要懇本人替他出點力。本人一口拒絕，說是你們如果要創立中日會館，我不獨自己樂於解囊，並且竭力招呼，你們現在的辦法，我根本不能贊成。你們以為把滿洲拿在手裏，殊不知拿了滿洲，

斷絕了中國。於是日滿會館，到底不能成立……在早晚市價不同的日子，這種談話，我覺得已經沒有記憶的必要。但是我所見的，有政治領袖，也有實業家，有少壯派軍人，也有新聞記者。綜合各方面情形，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微妙感覺。概括的說，就是東京空氣，的確與平津不同。日本自上至下，感覺日本的危機，不下於中國，日本的處境，或者比中國還要困難，這是事實，無可諱飾的。不過這種困難，一半是日本自身造成。遠的姑且不講，就拿最近四月十七外務省聲明來說，現已經過三四星期，世界疑惑，可以說終久沒有解釋。據巴黎五月三日電報還說是：

日對宣言，僅予解釋，以圖緩和目前空氣，並未否認，亦未收回。其宣言用意，似在試探世界輿論及英美態度，終則仍將堅持，且貫徹其所抱之政策。

日本政府用意果然如此，那就大可不必試探。九一八的苦迭打，世界上人並沒有忘記，這種試探，可謂多此一

舉。如其沒有這種意思，而他們的本意，如同廣田外相歷次的解釋，以及五月三日駐法日大使佐藤交與法外長的文件說是：

日本以至誠意思，希望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並盼中國臻於和平及繁榮。但此種目的，在原則上應由中國自身覺悟，並恃本身勢力以達到之。

照此說來，那麼四月十七究竟有何必要而放出那種驚人的雷聲。四月二十三日我路過上海，曾經拿這句話當面問日本公使，他也是非常為難。當然，他在外交官的地位，不便多說，他的回答是即使要發什麼聲明，等本人回國問明以後，也還不遲。我又在五月一日，乘答訪日本駐平代辦若杉君的機會，談到這件事情，我問他究竟是什麼動機。若杉君的說明，足有二十分鐘，誠懇而深切。大意是日本決無獨佔東亞，更無侮蔑中國的一切意圖。至於門戶開放，毋寧為日本所主張。照這樣看來，四月十七的非正式聲明，簡直是無的放矢，平空惹起一場糾紛，終久在世界人類頭腦裏留下一層黑影，除此以外，試問有什麼收穫。這不能不說日本的外交拙劣。

這幾天各報又登載日使有吉氏的水鳥外交。他的定義是「水鳥浮在水上，表面很鎮靜，其實在水中的兩足很忙

。就是對華外交，在表面要裝出鎮靜態度，取不即不離之原則。世間有主張公開直接交涉，一氣解決一切懸案者，此種辦法，弄巧成拙，不能成事。」

我們常覺得對日外交最困難，在日本方面，也何嘗不以對華外交為最困難。一則因為這幾年來，種下惡感太深，而中國本身，也是始終沒有正確的辦法。所以兩國外交，彼此都覺得軟又不是，硬又不是，急既不對，緩亦不宜。站在責任地位的人，當然痛苦。不過據我們的看法，只要果然上了外交途徑，那就不難得到比較適宜的方策。所以這回我與廣田外相談話的時候，他問我中國人對於日本有何希望。我老實告訴他，第一是希望日本外交官增加力量，說話可以算數，彼此就有話可談……

有吉公使所謂水鳥外交，不能不說他是苦心孤詣，不過據我們看來，水鳥外交也好，水獺外交也好，如其依然是向來的狀況，日本外交官，心有餘而力不足，壓倒在一種氣餒之下，不敢多講一句，講了也是廢話，那就談不到外交方式。假使日本朝野真正覺悟，外交官多少有點獨立的權能，可以自由發揮意思，那麼我敢說水鳥外交還是不妥。照我的意思，應該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步，應該名為「死尸外交」。我們應該知道，事

到如今，不光是中日兩國的人民神經緊張到極度，就是世界各國也同樣陷於神經過敏。水鳥的腳，雖然在水面以下，也是以掀起波動。尤其是在水裏的魚蝦，一看見水鳥悠然而來，一定疑心他對於自身必不放過，所以在短期以內，應該裝做死尸，不言不語，不動彈，不叫喚，使人心安定，神經恢復常態，而日本朝野首先擴張已有的良好空氣與熱誠，然後才可講到第二步。

第二步是怎樣呢，我的意思，可稱之為孤哀子式外交。兩國人士，須明白今之中日二國，處境之艱難可痛，好比遇見親喪。兩國的賢達，應該把一切虛榮，誇大，懷疑，嫉妬等妄念，刪除淨盡，很鄭重的主持這件大事。日本人須知道中國的國喪，決不是日本的國慶。彼此如其能想到這一點，應該痛自責備，以極誠敬極悲哀的態度來處理後事。

張伯苓校長最近在新生活運動會席上說，我們的鄰居，除掉壓迫我們之外，樣樣都好。這是最近到過日本的人們，和平時留心日本事情的朋友所不能否認的。我再補足兩句，就是日本人運用理智的時候，萬分精明，感情衝動的時候，萬分愚蠢。世界人類，雖然都犯這個毛病，而日本人尤甚。我們中國的民族，歷史較長，更事較久，講打

架雖然比不過日本，但是講到閱歷上，畢竟比較老練。我們國民應該覺悟自己這種老前輩的資格，看出日本人的弱點，在我們國家的領土主權上，當然絲毫不能放鬆，不過人云亦云的指摘，漫無邊際的惡罵，却不可不加以審慎。而且在這種空氣轉換的時候，應該讓他們有一種轉換面孔的餘裕。五月二日天津益世報社論，有一段說是：

「我們也不能不知道日本的外務省是比軍部爲開明。現在廣田重光及有吉等會議的結果，既希望能和我直接交涉中日問題，則我國更不能不有相當對策與之周旋。我們應注視日本文人及武力勢力的消長上下。」

五月七日益世報的社論是：

「日本文人首先應有此覺悟。武人如終不能覺悟，則文人且負有威化的責任。如日本統治階級能翻然改悟前非，一方還我東北，一方又不求獨佔，則中日親善，將成爲指顧間事；而日美日俄戰事的危險也可減少一半。」

於此足見我國輿論對於日本到底沒有絕望。我根本贊成這種論調和胸襟。我還要聲明，我們的輿論界，對於日本文武兩方面，絲毫沒有挑撥感情的作用。自從九一八以來，

我是反對日本軍閥最烈的一人，我公然指摘他破壞東亞和平，公然指摘他誣謗日本民意，並且公然指摘他們對於日本爲誤國。所以我這回到日本，軍人裏頭有許多從前的相識，我都不願和他們見面。但是據我這一次的觀察，覺得日本軍人也不無感覺到事體的重大，感覺到世界上不光是日本一國，感覺到未來時局之可畏，感覺到武力並非萬能。這種印象，雖不能使我遽抱樂觀，但我覺得溫從四十五度退到三十八度的時候，應該補助他一點下熱劑，使他快一點恢復平溫，同時覺得日本人究竟是聰明的民族。

日本人富於血氣，少壯軍人尤然。在感情衝動已經過去，理智正在萌芽，考慮永久利害的時候，我們不犯着加以無謂的刺激。但是讀者不可誤會，以爲我主張遷就他們，須知日本人的性質，可以責備而不可以加以激怒，可以與之掙紮而不可以施以侮辱。他們是尊重自己國格和人格的，所以也知道尊重對手方的國格和人格。我們有堂堂正正的理山，當然直言無忌，用不着外交辭令。如其有不肖的人們，與他鬼鬼祟祟，他們簡直瞧你不起。這不是船來的西洋貨，乃是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老古董也就是對待日本人的正當辦法，至少是我個人與日本人來往的信條。

以上的話，說得也不少了。但是我們要知道，日本軍

間有一部分，自己硬做成負嵎之虎，他自己何嘗不覺得進退兩難，但是無論何人，不能替他想法，也不能奈何他，這真是東亞病夫的癩腫。目下和最近將來，如有風波，一

定由這一角上捲起，但是赫赫的日本帝國，終久也被這班渾人拖入東洋大海。假使我的看法不幸而中，那麼我這篇廢話，當然應該根本取消。

二十三年五月九日

太監

豈明

中國文化的遺產裏有兩種特別的東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們歷史的長短排列起來，其次序爲太監，小脚，八股文，雅片煙。我這裏想要談的就是這第一種。

中國太監起於何時？曲園先生「茶香室四鈔」卷八有「上古有宦者」一條，結果却是否認，文云：

「明張蒼疑耀云，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人生靈者，有宦不生髮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按此論見靈樞經卷十，五音五味篇。……素問靈樞皆託之黃帝，張

氏據此爲黃帝時已有宦者之証，余則轉以此語決其非上古之書也。」據說在舜的時代已有五刑，那麼這一類刑餘之人也該有了罷，不過我於史學很是荒疏，有點不大明白，

總之到周朝此輩奄人的存在與活動幾很確實了。德國列希忒(Hans Licht)在所著「古希臘的性生活」(一九三二英

譯本)第二分第七章中講到閹割云：

「此蓋是東方的而非希臘的風俗。據希拉尼科思說，巴比倫人最初閹割兒童，此種凶行由居洛士大王傳入波斯，克什諾芬云。又通行的傳說則謂發明此法者係一女人，其人蓋即亞敘利亞女王色米拉米思也。」巴比倫盛於唐虞之際，亞敘利亞則在殷初，皆在周以前，中國民族的此種方法究竟是自己發明，還是從西亞學來，現在無從決定，只好存疑，但是在東亞則中國無疑的是首創者與維持者，蓋太監在中國差不多已有三千年的光榮的歷史了也。

太監的用處在古書上曾略有說明，如周禮秋官掌戮下云，「宮者使守內。」鄭玄注：「以其人道絕也。」又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云：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卷伯刺譏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

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二者所說用意相同。這宮者的職務雖然與上下文的「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等似是同例，實際上却並不然。臉上有金印與門，沒鼻子與關，都無直接的關係，唯獨宮者因其人道絕所以令看守女人，這比諸六十歲白鬚子老頭兒當女學校長還要可靠，真可以算是廢物利用的第一良策了。希臘羅馬稱太監曰典牀 (Eunoukhos)，亦正是此意。

照周禮看來是必先有宮者而後派他去守內，那麼這宮刑是處罰什麼罪的呢？尚書大傳說：「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揆之原始刑法以牙報牙之例是很有道理的，但畢竟是否如此單純也還是問題，如鼎鼎大名的太史公之下獄室就全爲的是替李陵辯護，並不由於什麼風化案件，大約這只是減死一等的刑罰罷了。倒是在明初却還有那種與古義相合的辦法，據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云：

「洪武間金華張尚禮爲監察御史。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沈沈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帝帝以其匪慕寫宮闈心事，下蠶室死。」老實說這詩並不怎麼好，也不見得寫出宮闈心事，平白地按照男女不以義交辦理，可謂冤枉，不過這總可算是意淫

之報，有如玉歷鈔傳等書中所說。徐鉉編「本事詩」卷二載高啓宮女圖一絕句，又引錢謙益語云：

「吳中野史載季迪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諸小侯爰書及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避之詞，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爲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今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於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此與張尚禮事正相類，只是沒有執行宮刑，却借了別的不相干的事處了腰斬，所以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問題似無直接的關係罷了。

肉刑到了漢朝據說已廢止了，後來的聖主如明高皇帝有時候高興起來雖然也還偶爾把一兩個監察御史丟下蠶室，以爲善慕寫宮闈心事者戒，可是到底沒有大批的執行，要想把這些宮者丟充內監使用，實在有點供不應求，因此只得另想方法，從新製造了。明朝太監的出產地聽說多在福建，清朝則移到直隸的河間。其製造法未得詳知，偶見報上記載恐亦多道聽塗說，大抵總如巴比倫的閹割童兒罷。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七云：

「明制，小閹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服藥者，初爲核人也。事隸兵部。二月二十二這一

句話我想未必一定出於李義山，大約只因為有好幾個二字，彷彿是拗口令，可以試驗口齒伶俐與否，但是使我們覺得很有意思的却是事隸兵部這句話。爲什麼小園過堂是屬於兵部的呢？據魏瀾「嶠南瑣記」（觀雲乙編本）云：

「江直，藤峽，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南方征勦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用。此真所謂刑餘也。」這大約只是偶然一回，未必是成例，恰巧與兵部有點相關，所以抄來做材料，也可以知道奄人的別一來源耳。

順天府志卷十三坊巷志上本司胡同條引明于慎行「殺城山房筆塵」云：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相傳教坊司門曾改方向，形家見之曰，此當出主帶數條。聞者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宮之，使入爲鐘鼓司官，後皆賜玉。」又沈德符「敝帚齋餘談」（觀雲乙

編）亦云：

「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者記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主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夢小優數人，命閱之。留於鐘鼓司，俄稱上意，俱賞蟒玉。」游龍戲鳳的皇帝偶爾玩一點把戲，原是當然的，水鄉小孩看見螃蟹，心想玩弄，却又有點害怕，末了就把蟹的兩隻大鉗折去了，拏了好玩，差不多是同樣的巧妙的殘酷罷。

太監是一個很有興趣的題目，却有很深長的意義。說國家會亡於太監，在現今覺得這未必確實，但用太監的國家民族難得興盛，這總是可以說的了。西歐各國無用太監者，就是遠東的日本也向來沒有太監，他們不肯殘毀人家的文體以維男女之大防，這一點也即是他們有人情有生意的地方。中國太監制度現在總算廢除了，可是有那麼長的歷史存在，想起來不禁悚然，深恐正如八股雖廢而流澤孔長也。

蘇俄旅行記

丁文江

楔子

太平洋道中

民國廿二年六月廿三日我從上海乘古列基總統號的船到美國去。當廿一年有幾個朋友提議到蘇俄旅行邀我加入

的時候，我並不熱心，因為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而且又不諳俄國話，恐怕化了許多錢絲毫沒有所得。廿二年的春天他們又重新提議，允許我便到華盛頓赴國際地質學會，由西歐到蘇俄；在蘇俄我可以單獨做地質旅行而且除去觀察地質之外不必擔任其他的調查。於是我趁此機會先到華盛頓去赴會。

同船去赴會的還有葛利普 Grabau 德日進 Tellhard de Chardin，赫那 Honey 和葛先生的秘書伍夫人。除去赫那以外都是我的老朋友。赫那是赫定 Hedin 先生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團員，在青海新疆做了許多工作，現在要回瑞典去。德日進原是巴黎天主教大學的地質教授。因為他做了兩篇文章贊成進化論，被他基督會的上司革了職，放逐到遠東來，歸在中國的基督會嚴加管束。但是他不但不介意，而且歡天喜地的跑來，因為他認為這是上帝給他研究中國地質的好機會。果然到這裏來不到一年就在河套發見了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一九二九年回到巴黎就被舉為那年法國地質學會的會長。基督會的長官仍然不願意他在巴黎住，所以他又回到遠東來，拿三百元一月的薪水在地質調查所的新生代地質部做研究員。葛利普是德國種的美國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牧師。他却是極端反對神祕宗教。他原

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十六年的教授。到了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歐戰，各大學紛紛的做反德運動，他就被革了職出來。一九二〇年他到中國來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兼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主任。他不但是工作極勤而且是熱心教育青年的人。當北京大學屢次索薪罷課的時候，他總把地質系的學生叫到他家裏去上課。他因為「風濕」病的原故，兩腿不能走動，手指也都腫脹，然而他的工作比任何人要多。這一次美國地質學會供給他一部分的經費，他纔能回國去赴會。我們五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一個瑞典人，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種的美國人，一個英國婦人，加上了我一個中國人，成為全船上最國際化的一張桌子。

葛先生在中國十二年，而且他決心終身在中國服務，所以他痛恨日本人。廿六日船到了神戶，日本人上船來檢查護照。葛先生就很不願意：「我又不要在日本上岸，他們為甚麼還要查我的護照？」我告訴他我們是在日本領海裏，只好聽他。日本驗護照的人的知識是很有限的，外國話是不大懂的，而又喜歡裝出很大的架子。驗葛先生護照的時候，一切問話都是我代他答了，倒還痛快。等到輪着他的秘書伍太太時候就麻煩多了，因為伍太太帶的是一張臨時的護照。查驗的人問來問去弄不明白。葛先生看得不

耐煩起來，對他厲聲的說道，「她是我的書記。我們自從你們佔領中國的土，殘殺中國的人民以後，再也不願意把脚踏到你們國土上。你還不快點把護照交還她！」那個檢查員大概也沒有十分聽懂，只向葛先生瞞了兩眼。在他們兩位護照上面打上「不准上陸」四字，然後算完結。當時在場的人都對葛先生表同情。有一個人告訴我说，「日本驗護照的人實在太沒有腦袋了。同船的一位小姐把護照給他看。他照着護照上的款項一一問下去。『你結婚了沒有？』『沒有』。『你有子女沒有？』這位小姐大怒，同時在傍的人都大笑起來。然而這位檢查員似乎沒有懂得有甚麼可笑，仍舊面不改色的向下問去！」

驗完了護照，葛先生一個人坐在甲板上，還有餘怒。忽然有不識相的日本人來向他招攬買紀念品。葛先生對他厲聲的說道，「自從你們佔領了中國的土地，殘殺了中國的人民以後，我發誓不買日本貨。你快點給我走開去！」於是全船的人都知道葛先生是個中國迷；他的愛中國遠勝於中國人自己。

七月四日船到了檀香山。畢叔普博物院的主任布利安先生來接我們，用他的自用汽車帶領我們遊覽了大半天。除去了伍太太之外我們都是到過檀香山的，但是大家都頗

意再把舊游的地點溫習一遍。山上的火山跡，海邊的珊瑚礁，都是學地質的人所應該注意的。此外如水族館的動物，公私園林的植物，奇綠的海水，深紅的土山都是有目共賞的。我個人所最喜歡的是檀香山的氣候。華威夷羣島已經完全在熱帶裏，然而終年的溫度並不很高；不但沒有漢口九江的那樣酷暑，就是比上海北京的夏天也溫和的多。所以檀香山可以說有熱帶的好處，沒有熱帶的壞處。我把這話告訴布利安先生。他說，「還有一點也是檀香山的特色。檀香山是太平洋的孔道，所以人種方面很是複雜。但是各種人相處得異常的和洽，從不聽見有種族的爭鬥，連日本人都能與人相安！」

布利安先生把我們送到海邊一個小飯館裏吃晚飯，因為他晚上另有約會。走上樓去，滿座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學生；原來是慶祝七月四日國慶來開會的。學生之中土人之外還有中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我們從傍看他們喝着吃着，說說笑笑，演說以後又有本地的音樂，覺得布利安的話是不錯的：檀香山種族的成見是比較的不深的。吃完了飯葛先生還要去看法威夷的跳舞，叫侍者去僱汽車。葛先生又囑咐不要日本人開車。等到我們下樓，我聽見掌櫃的打電話，只是說「摩西摩西」，我方纔恍然大悟，飯館子

原來是日本人開的！因為他們美國化很深，連我不留心都沒有看出！

夏威夷的露天跳舞場是在郊外。凡有常看電影的人都領略過的：歌舞音樂裝束，都與我從前在電影裏看見的一樣。只有最後兩個小孩子上高樹取可可蕉果是電影裏所沒有的。歌舞的人大半是混血種；爲首的一個男子幾乎完全是一個美國人。葛先生看了却異常的高興；每奏完了一劇

關於科學研究之我見

濤鳴

他熱烈的拍手。最後他又立起來和做首領的那個人拉手：「我們很謝謝你肯努力保存這種歌舞和音樂。這是很重要的工作，希望你永久的維持下去，使得本地的文化不要消滅！」聽見他話的人都很感動。一個女子走過來把她的一串黃花圈拿了下來套在葛先生頸上。我于是覺得一個人的熱忱表現如果是真的，總可以獲得人的同情的。

衣食住行都到了美滿地步的西洋人，精神能力沒有出路，于是舉起望遠鏡望天上看，把從恒河沙數里外來的星光，用分光鏡分析一下，因而推想星中有什麼原質，溫度是幾千度，年齡是幾兆年；或且跑到荒山幽谷，發掘古代遺骸，從一粒牙齒之微，推想幾萬年前原人的飲食習慣。這種工作，是極有趣味的，是能廓充人類的眼光和思想，在文化上是很有價值的。但是這種工作的結果，離開國計民生的問題，是很遠的。

不但空間距離遠的天文，和時間距離遠的古生物，與國計民生的關係嫌遠一點。就是沒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的物

理化學，甚至於與我們同是有生的動物和植物，也有許多的問題，只有學理上的價值，而無實用的價值。不錯，今年的理論，明年變爲實用，在科學上是常見的。並且一個理論研究的結果，縱不能直接應用，往往可以促進別的理论研究，而間接產生應用的結果。所以真正科學家，對於研究的問題，不問有無應用的可能。但是我們要知道同是理論的問題，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關於此點，俟後日再談，現在不必細說。

研究科學不但是要用腦力，並且是很費錢的事情。所以我們可以把科學研究，當做一件投資事業看。投資的方

針，要看資本多少。大資本家可以把一部份資本去採礦，

不圖近功，而求遠利。成功固好，失敗也無妨。小資本家就不能這樣；因為目前之生活問題，先要顧到，所以只能經營即刻能生利的事業。研究科學的方針也是這樣。歐美各國科學研究的機關隨處皆是，科學家之衆，可以比我們科學時代的文人，所以他們研究的問題，不必限於應用。

於許多理論研究之中，自然有些結果，可以改良他們已美滿的環境，或且可以增進他們已經豐富的人生樂趣。我們中國計民生問題，還沒有法子解決，那裏有工夫去高舉理論的科學呢？

解決國計民生問題，在在需要科學，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不過中國現在所急需的科學，是歐美各國已經見諸實用的科學，而不是什麼我們自己發明的新學理。我們要修鐵路，當然需要工程學，但是我們不必去求什麼工程新學理，歐美各國已有的工程知識，就够我們用了。我們要改良公共衛生，當然需要醫學，但是我們也用不了去發明什麼新東西，歐美各國已經施行的衛生方法，也就够我們用了。我們縱欲駕歐美而上之，也得先趕到他們，然後再想走到他們的前面去。

中國現在雖然不忙去做甚遠窮高的研究，應用的科學

研究則刻不容緩。

農業工業的問題，是有地方性的，外國的情形同中國不同。我們要改良農業，必需研究各地的土壤，各地的農種。我們要振興工業，必需研究各地的出產。他如中國藥材之生理作用，食品之營養價值，通國計民生有直接關係，近來頗引起國人注意，可惜還沒有大規模的工作。

世界各國科學研究機關之多，莫過於美國。美國之科學研究機關，可分爲四類：一屬於政府者，如農部之化學局，商部之標準局。二屬於工業者，如貝兒電話公司，普通電氣公司，禮來藥廠，各有其研究所。三屬於學校醫院及其他公共機關者。四獨立研究機關，如羅氏之醫學研究所。屬於工業之研究機關，其研究之範圍，當然偏於應用。屬於政府者亦然。但在各大學之研究所及獨立研究機關，則理論與應用並重。美國的研究機關總算起來，須以千爲單位，研究之題目幾乎無所不有，理論應用之分不必看重。我們中國的研究機關，寥寥無幾，所以研究的範圍，我們應該仔細的考慮，看看那樣最合算。

中國的大學，從前簡直沒有人做研究，近幾年來纔有一點研究的成績，在外國科學雜誌發表者，少如鳳毛麟角。吾們所應首先注意者，他們所得的結果是否可靠，在科